

压缩三公经费不能“挤牙膏”

在一些地方,三公经费已是连续下调,这是个好现象。不过年年压缩一点儿,也难免让人怀疑:“三公”支出中的水分并没有彻底挤干净,“严控”还没真正到釜底抽薪的地步。

□评论员观察

本报评论员 赵丽

在最近密集召开的地方两会上,大部分省市区公布了去年三公经费,同比下降多在两位数。同时,一些省市区也提出今年三公经费下降预算,少则5%,多则30%。(据1月23日《第一财经日报》)

各地下调三公经费预算,与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的时代背景相契合,这也是政府过紧日子的必要举措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一些地方,三公经费已是连续下调,这是个好现象。不过年年压缩一点儿,也难免让人怀疑:“三公”支出中的水分并没有彻底挤干净,“严

控”还没真正到釜底抽薪的地步。

三公经费不但牵涉到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,也与党政部门和公职人员的作风相关,群众关注度非常高。近些年,中央对预算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,中央部门及省本级政府的“三公”情况也进入公众视野。而在压缩三公经费的大趋势下,不少地方下调了预算指标。从实际情况看,在这方面,有的地方步子迈得大一些,有的下调幅度则小一些。应该说,各地各部门情况不同,“三公”开支及降幅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,不能“一刀切”。但是,这里面也存在“是否还有更大压缩空间”的问题。

参照各地决算情况,这一问题更为凸显。每每地方晒“三公”决算,总会看到“结余”云云。例如,

2012年广东省级“三公”经费实际支出8.63亿元,相对预算结余1600万元。同年,北京市本级“三公”实际支出比预算少花了1.1亿元。这种情况屡屡出现,难免让人猜疑:到底是各地“节约有道”,精打细算从牙缝中省出钱?还是在预算中打了“埋伏”,能省一百只说八十,手脚散漫依然有剩余?如果是后者,那显然是“钱袋子”没扎紧还要赚成绩,和欺骗没什么区别。

显而易见,在中央严管公务活动、财政开支越来越公开透明的大趋势下,单说“有下降”、“有结余”难以让公众满意。大家更关心的是,确定预算的依据是什么?是真正按公务实际需要列支,还是在往年的基础上人为压缩一定比例?如

果是后者,那看似是年年做压缩,年年有进步,但实际上年年有浪费的空间,自然离中央要求和群众期待还有很大距离。

去年中央连续出台禁令,将接待、差旅、培训、出国等各方面都进行了限制。在这种情况下,2014年“三公”开支尤其引人关注。各地在公开“三公”预算时,不妨把账算细一点,将确定依据、人均支出、用途等方面一一作介绍。这样既可以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和精细性,同时也方便公众监督,在削减三公经费方面,政府是一点点“挤牙膏”,还是一步到位,从中不难看出端倪。在厉行节约的大背景下,再在三公经费上打小算盘,只会招来骂声,这点各地当有足够认识。

□圆桌评论

“习惯性送礼”也得改改了

在“八项规定”等禁令之下,公款送礼之风得到了有效遏制。不过临近春节,送礼现象仍然大量存在。很多礼品都是来自个人或企业,流向的对象则是掌握着一定公共资源或是公权力的人。

过年送礼品 成了惯性思维

刘海鹏:今年很多人都在说,真是没有一点年味。没人来走访送礼了,办公室连个新的台历都找不着,真不像快过年的样子。

姜士强:这说明“八项规定”等起到了效果。不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,过节与礼品绑在一起,已经成了一些人的思维惯性。

许建立:有孩子的不给老师送点礼,摆小摊的不给城管送点礼,经营企业的不给监管自己的职能部门送点礼,可能连年都过不踏实。虽然禁令有了,但大家的思维还没有变。

刘海鹏:有的公职人员把收礼当成了习惯。送礼人为了迎合,还得大费周章,送什么才能体现心意,怎么送才能不“害”了对方,都要考虑到。

送礼成风 自己也是推手

姜士强:在不少人看来,自己也不愿意费心费钱送礼,只是社会风气使然。殊不知,社会风气的形成每个人都有“功劳”。

刘海鹏: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心态,自己不想送,又担心别人送,每个人都成了送礼之风的推手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收礼者也慢慢地改变了心态,本来就应该做好的分内事,反而成了对送礼者的照顾。

许建立:送礼之风盛行,确实也把一些公职人员惯坏了。前年送,去年送,今年不送就感觉送礼人对自己不尊重了;别人送你不送,更是“大不敬”。有一位落马官员曾向记者坦言,送礼给自己的人太多,也记不清谁送了什么,但“谁没送礼”还是要记住的。

姜士强:送礼人的殷勤加上收礼者的不自觉,形成一种恶性循环。任由送礼之风盛行,最终害人害己。

权力关进笼子 礼品没了市场

姜士强:送礼之风盛行有一个重要原因,那就是送礼很多时候能够换来实实在在的好处。正是权力运行中的漏洞,给了收受礼品者“两厢情愿”的“交易”空间。

刘海鹏:此前就有媒体报道,某地环保局长自称“分分钟可以搞垮一个企业”。这位局长只要略有暗示,哪家企业敢不送礼呢?

姜士强:还是得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如果送再贵重的礼也换不来权力的“特殊”回报,与腐败挂钩的礼品也就不会有市场了。

许建立:制度的完善是个长期的过程,人们或许也该思考一下,自己可以做些什么。礼品送不送,这是送礼人的选择;礼品送上门,收与不收也是公职人员可以自己决定的。总是把责任推给社会,与不良风气同流合污,本身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。

利,都是好事,可是如此高调而赤裸的炒作,难免会使年终奖发放陷入恶俗,引发哪家企业“钱山”更高的争斗。与发放现钞不同,部分企业把年终奖金分为尽孝补贴、教育补贴等门类,贯穿全年、实报实销,虽然“给钱”的结果殊途同归,但其引导员工关心家庭、健康生活的善意可圈可点。

年终奖发放是门学问,也是企业管理理念的注解。现钞生猛,能砸中员工神经,也能砸蒙企业价值观念。凝聚人心、鼓舞斗志,不是一掷千金就能解决的事情。重口味的年终奖该消停消停了,在用人难、留人难、聚人难的当下,用更加有效的制度管理企业,对员工的“刺激”会更加持久。

□公民论坛

重口味的年终奖该消停了

□李亮

近日,有媒体报道,河南一房企年会发千万现金,员工用麻袋扛钱。其实,企业年终奖现钞“砸向”员工已屡见不鲜,公众也一再领教土豪企业一掷千金的实力,嗅到“现钞”的厚重气味。

毋庸讳言,年终奖发放现钞给力却又费力。银行提现、一路“押镖”、现场“安保”,各个环节不得有疏;员工激动地接过奖金后,又得“忐忑”地将钱“送回”银行。企业这般折腾不外乎有两个用意:一是感官刺激可以制造狂热、提振士气;二是制造眼球效应,增强企业知名度。

落实绩效奖惩、提高员工福

监管失位,打车软件伤了打车人

□罗志华

近日,记者在北京街头采访调查发现,受两大打车软件“烧钱大战”的刺激,马路上挂着“暂停牌”的空出租车越来越多,或是奔赴“抢单”后约定的接客地点,或是停在路边等着“抢单”,对于身边的招手拦车则熟视无睹。(1月23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出现这样的情况,是打车软件公司之间的无序竞争所致。为了抢占市场,他们大打“烧钱大战”,展开排他的市场挤压,不仅不向出租车司机收费,反而按次给予司机补贴甚至其他好处。如此一来,原本很有前途的打车软件可能因此误入歧途。假如几家公司势均力敌

并死磕到底,唯一的结局是两败俱伤,最后无以为继,打车软件也难逃陪葬品的命运。

更重要的是,打车软件无序竞争,对传统的打车习惯也构成不小的伤害。司机通过软件来选客人,以拼小费竞价来变相抬价,许多不良行为因规则的失范而产生,乘客不仅不能通过软件叫来服务,反而连招手即停也变得不容易。

对此,相关职能部门不能袖手旁观,任由市场主体无序竞争,很可能新秩序没形成,旧的秩序就被破坏了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,决不意味着监管者可以当“甩手掌柜”了。毕竟,维护消费者权益,保证市场有序运行,是监管部门无法逃避的责任。

城镇化须尊重农村主体性

□媒体视点

春运又到了。每年这个时候,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季节性往返大迁徙,成为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真实注脚。

就我国而言,由于历史、国情等多方面原因,城乡关系失衡比较突出,城乡二元样态呈现出“中心(城市)—边缘(乡村)”的结构。这不仅体现在城乡物理空间上的隔离,还体现在城乡居民社会空间上的分殊,尤其是城乡居民存在的发展机会、社会福利差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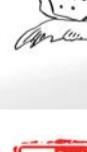
在这种情况下,很容易产生将城市视作高于农村的区位空间的价值预设,由此造成了“传统—现代”的二元叙事思维定式:农村是自然经济,城市是市场经济;农村是伦理社会,城市是法理社会;农村是落后地带,城市是先进文

明……这种典型的城市中心主义思想,不仅将落后、贫困的标签贴在农村文明上,还固化进一些基层治理者的脑海中,农村被束缚到了城市扩张的战车上,成为予取予夺的对象。

纠正城市中心主义偏见,解决城乡失衡问题,理应成为当下各地城镇化政策设计的逻辑支点和现实愿景。城镇化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,有其自身的规律,人们可以在探索其内在机制的基础上预先作出规划和应对。城镇化过程中的人为干预,必须围绕建构城乡良性互动关系来进行,从体制和福利层面提供助力,尊重农村主体性,从而孕育一个既有城市性又不失农村性的完整文明系统。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,作者李远行)

■本版投稿信箱:

qilupinglun@sina.com



一窝端

近日,被誉为“民间反腐败研究第一人”的律师王荣利推出《2013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案例报告》。报告称,117例国企高管和233例民企老板在2013年犯事,许多落马官员与落马企业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漫画/张建辉



齐鲁晚报逸周末微信
qiluyizhoumo
山东最实用的微信

云拍读报



免费下载
“云拍”客户端,
对准报纸上带有
“云拍”logo的图
片拍摄,便可观
看视频。